

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赵剑英 总主编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批判与当代中国

侯惠勤 著

意识形态是当代纷繁复杂之精神现象中最为复杂的一种，
折射着近现代数百年历史之沉浮、世事之变迁；
意识形态又是现今“脱节时代”的一个极混乱又极重大的话题，
聚焦着经济全球化下的“东西”冲突、“南北”战争。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解密意识形态的滥觞，
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活水。
学术性、思想性与当代性统一于历史逻辑的全景式展开，是本书的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赵剑英 总主编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批判与当代中国

侯惠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侯惠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

ISBN 978-7-5004-8419-6

I. ①马… II. ①侯…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意识形态 - 理论研究
IV. ①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630 号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有限印刷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9.5 插 页 2
字 数 763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百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业已通过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充分的检验和证明。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全球化条件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理论和方法上给予深刻的揭示和说明，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给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科学的论证和指引。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发展实践表明，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当今世界格局和经济政治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诸多全球性问题纷至沓来。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也正处于关键阶段，社会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的压力巨大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面临重大冲击，党的执政方式与能力面临复杂而严峻的考验。这些重大的现实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对于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无疑是一项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绝不仅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研究队伍以及机构规模的扩大，而更应体现在关于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课题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上。本文丛旨在推出高质量、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成果。在选稿标准上，坚持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统一，坚持思想性、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统一，倡导求真、创新、严谨、平实的学风和文风。希望《马克思主义学术文丛》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创新成果的展示平台，期盼广大读者对该文丛予以积极关心、支持与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赵剑英

2010年3月2日

序

意识形态聚焦当代中国：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当代世界不仅是快节奏的生活、急剧变化的场景和层出不穷、难以理喻的事件，更是人类文明的彷徨，人类根本价值取向的混乱，价值重估、价值颠覆、价值空场的混战；不仅是现代文明的多棱镜式的展示，更是如同德里达在其名噪一时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借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指称我们的时代所发生的断裂的那样，这是一个日益“颠倒混乱”的世界。^①“反文化”形式下的文化渴求、“非意识形态”下的意识形态诉求，道德需求的旺盛和道德资源的匮乏并存、世界化和殖民化同在、物化和个性化俱增等等。实际上，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就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

^① [法]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① 这一“脱节”的根在哪里？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看法，离开了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至从北美“独立宣言”1776及1789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历史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观点。这样，意识形态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走到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西方意识形态反复制造的一个幻觉，就是“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因此，当这一幻象被历史发展一再打破时，它只能用“出乎意料”来解释。这样，它透视中的历史就常常出人意料，而有趣的是，这种意外往往发生在世纪之初。关于20世纪初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变“祥和”为“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的，兹·布热津斯基是这样为我们描述的：“1900年的元旦，各大国首都的主导情绪一般来说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全球力量结构看来是稳定的。当时的帝国似乎既是稳固的，又越来越开明。有些国家，像奥匈帝国，甚至本该说成是温和稳健和种族共居的典范。不论是伦敦，还是巴黎、柏林、维也纳或圣彼得堡，这些主要的首都都正开始享受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还蒸蒸日上成为文化中心。……最重要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至少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对地不为感情所动。民族主义正日趋强大，但它尚未占主要地位。统治集团内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共识，更不用说在当朝君主之间盛行的联姻了。对科学革命越来越大的信任带来了对人类前途的乐观情绪。有很多评论著作欢呼20世纪的来到是理性时代真正的开端。……与其前景看好的情况相反，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充满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② 但是，布热津斯基并没有给我们正确指明这种“和平”的幻觉是如何被颠覆的，没有反省西方意识形态是如何粉饰资本主义矛盾的，更没有对资本主义痼疾做科学诊断，相反，他却将这一切归咎于共产主义等思想体系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并认定这种挑战通过20世纪的实践已经宣告失败。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② [美]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样,历史的重演就不可避免,而这种重演恰恰又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

1989年,面对着危机重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满怀信心地要给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画上一个句号,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以“历史的终结”这一极其大胆的论断而轰动一时。1992年,受到“苏东剧变”的鼓舞,福山进一步从历史观上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使“历史的终结”演绎成了一种完备的历史分析框架。他指出:“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的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①

福山的整个论证大体上是依据黑格尔植根于人性的“欲望”分析,以此解释其“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最终指向。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理性欲望”从根本上解释了历史的动力及其最终的制度构架。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人固然有对自我保存所必需或超出这一需求但为自己所缺少的物质的本能欲望,但人更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的价值需求,“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对这一重要性的理解,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解释许多过去我们似乎很熟悉的现象,如文化、宗教、工作、民族主义,还有战争。”他认为,获得认可的欲望这一历史的发动机,曾把人类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主奴关系”成为难以逾越的历史模式。但是,这种获得认可的欲望表达方式本质上还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动物式的本能欲望没有根本差别,不能真正表达这一欲望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代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的属人性质。只有“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黑格尔的伟大诠释者亚历山大·柯耶夫在他 20 世纪的著作中，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因此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他所称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即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①。很明显，在福山看来，结束阶级对立状态（“主奴关系”）的制度构架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其蔑视，将其视为已经不再值得讨论的思想，是福山从而也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部理论框架的软肋。“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②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平等理想也是完全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尽管它也能诱发出追求消灭所有不平等的狂热，但终究会不攻自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共产主义试图依靠国家权力消灭经济上不平等的时代的尾声。……自然在这一点上支持我们，就是有人可以把自然扔出去，它也肯定会跑回来。”“马克思主义寻求主张按需而不是按贡献大小分配及消灭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借此来推行牺牲自由的极端的社会平等形式。将来所有试图超越‘中产阶级社会’建立社会平等的设想，都必须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这一设想在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因为如果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肯定会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强权国家。”^③从人性的分析上看，他指认马克思的平等设想扼杀了人性中追求被认可的欲望，因而只能依靠暴力和专制统治，并终将为不可违反的人性所否定。

因此，福山的重点是回应“历史的终结”之后如何防止欲望摆脱理性，致使人成为“最后之人”的同时回到“最初之人”，致使精神自由的实现同时成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回归。“人们从共同体生活的衰落中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12 页。

^② 同上书，第 334 页。

^③ 同上书，第 356—357、331—332 页。

得到启示，未来我们很有可能成为无忧无虑的、专心于自身利益的最后之人的危险，他们除了个人安乐外缺乏任何精神追求。但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危险，如可能回归到为毫无意义的名誉而进行血腥战斗的最初之人，尽管只能使用现代武器。实际上，这两种危险相辅相成，都是因为‘优越意识’没有得到固定而且积极的宣泄渠道造成的，优越意识失去宣泄渠道就只会以一种极端的、变态的形式重新出现。”^①在他看来，结束了共产主义挑战后的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来自“左”或右的挑战，其实都是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极端诠释，是其内部的自我颠覆。“从长远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即对平等认可的狂热欲望。”虽然过度的平等意识对自由民主更具有颠覆性，但需要认真地从学理上加以借鉴的却是关于民主和获得认可欲望关系紧张的观点，“换言之，只要自由民主能成功地从生活中清除优越意识并用合理消费来取代它，我们就会成为最后之人”^②。

“最后之人”是尼采针对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旦实现可能出现的后果所作的假设，这将是一群获胜了的奴隶，也是一群丧失了精神追求和远大抱负、正在向动物回归的群体。自我保存取代了自我超越、追求卓越，宽容氛围下的充分选择导致了信仰的困惑和失落，从传统和权威的依附中解放的同时失去了历史的根基，个人生活中的高度隐私性导致社会道德约束松懈以及道德通则危机，相对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一切价值的丧失，再也没有胆怯和勇敢、羞愧和自豪、奸诈和忠诚，一句话，获得认可的欲望（自尊）也将失去。他的结论是，“解除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形式上的关系并不会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把他们变成另一种新奴隶”。福山并不认为这种假设会真正成为现实，更反对因此而向“最初之人”回归。他问到：“我们有必要担心我们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是人而是动物）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满足吗？或者如果我们在某个层面上感到幸福，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满，由此而想把世界拉回到充满战争、偏见和革命的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② 同上书，第356页。

历史中去，这样做您不感到危险吗？”^① 他认为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构架下，可以有多种发泄渠道帮助人们维持适度的优越意识，从而保持社会的生机活力和价值追求。“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些渠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家精神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也为人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其间，候选人与其他人进行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方面的观点交锋，在与他人竞争中获得公众的认可……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生活外，优越意识还在体育、登山、赛车等纯粹形式上的活动中找到越来越多的发泄渠道。”^② 他的结论是，“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区别，并不在于消灭了优越意识，而是把它引到了地下。民主社会坚持人人平等的命题，它们的精神是平等精神”。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社会就既不会制造新贵，又不会丧失活力；既解决了社会平等，又解决了人类精神的前途。这就是“历史的终结”的底蕴。

他的这一分析似乎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其后的岁月，在西方乃至世界，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③ 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其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历史讽刺意义。似乎是为此佐证，一个认识弗朗西斯·福山的西方人，在2007年岁末之际，对这位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进行了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② 同上书，第357—361页。

③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揭老底”：“我在1992年结识福山时，他正在为新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做宣传。他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之间的重大冲突已不复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似乎正逐渐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这句话真是充满诱惑且给人以希望，似乎进化过程即将达到快乐的终点。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解释2007年临近尾声时的形势。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得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范例提出了挑战。对全世界的许多人来说，民主的愿望不像安全和繁荣那样迫切。今年年末，这两个大国比柏林墙倒塌后的任何时刻都更满怀信心。有趣的是，就在他们抱定目标意识和蔑视态度的同时，西方却对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发展充满了怀疑。——《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美国的强盛程度已经比不上布什政府刚刚就任之时。”^①这并不是个别人的偏激情绪，而是开始在西方主流思想界弥漫的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历史的终结”成为现实，希望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不可动摇，希望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永远成为历史。可现实和理智又告诉他们，世界远远没有到达其所希望那样的一个终点，世界向何处去，现在看来至少还是不确定的。

更为重要的是，发端于2008年秋天、至今尚未见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颠覆了西方曾经弥漫一时的乐观情绪。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10月载巴希尔·戈特“今天的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一文，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领袖和那些感到被资本主义空前的财富增长抛在身后的人可能会大呼：‘可算逮到你了！’一致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当前的自由统治及其对所有社会结构的全球化适应性已经走到末路。”“当前人为的金融危机预示着一个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它预示着一场重大变革的开端。现在，所有人都必须清楚，如果某一制度只照顾极少数富人而不尊重每个人的经济福利，它便注定会落得同样的下场。”^②法国《费加罗报》2008年12月24日发表阿兰-热拉尔·斯拉马文章，认为2008年是

^① 英国《卫报》12月23日刊载亨利·波特文“中俄让‘历史终结论’落空”，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12月25日第3版。

^② 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0月9日第3版。

两大幻想的破灭：“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将要埋葬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两大幻想：人权的幻想和联邦欧洲的梦想。谁都不能保证这两个伟大的思想不在另外的场合、以另外的形式重新出现。但是，就这两大主题而言，（经济）危机已经促成了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让这两大理论最狂热的信奉者变得务实起来，迫使他们悔过：有些人大声忏悔，比如（法国外长）库什内；其他人则有意克制，比如大多数欧洲领导人。”^① 十分有趣的是，福山本人似乎也否定了自己作“历史的终结”预言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忽视重大历史事件去谈论历史的过程。他在最近主编的一部新书《出乎意料》中，收录了各学科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师的作品。福山在序言中指出：“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该书指出，专注于那些真正算得上“战略意外事件”的未知事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其中“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结束：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则被列为七大“战略意外事件”之一。^②

实际上，在 1997 年，即将步入 21 世纪的中国，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③ 2007 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④ 这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 年 12 月 26 日第 3 版。

② 辛西娅·C. 瓦格纳著，耿凌楠编译：《美学者预测世界七大“战略意外”》，载《青年参考》2008 年 1 月 29 日。

③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④ 《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第 2 版。

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①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实际上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追求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进步发展的时代旗帜。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通过“历史的终结论”所折射出的存在于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论并没有消除，他们不相信人类在政治设计上，如果离开了西方的民主自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因此，他们毫不掩饰地把西方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毫不掩饰对于其他价值观的蔑视和拒斥，这在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态度上集中而鲜明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加紧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是新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动向，也是其植根于国家核心利益所作的战略选择，不会因总统或政府的更迭而改变。在他们看来，对于中国来说，要么“西化”，要么“崩溃”，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②他们有些人也承认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统统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化”，而且确信通过他们的“怀柔政策”可以有效地加速这一进程，这就是所谓的“鸽派”；他们中有些人则始终持敌视的目光密切注视“红色中国”，中国的一切进步都被他们视为对于西方世界的极大威胁，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被他们视为中国“邪恶本性”的暴露，并成为他们渗透、分化、颠覆中国的依据和借口，这就是毫不掩饰的“鹰派”。可见，在“西化”、“分化”

^①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4版。

^② 据2009年6月30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2030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最新一期德国《焦点》周刊刊登了德国“未来预测和技术评估研究所”学者克莱比希的两种极端预测：一种是“在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改革派的呼声增强，他们要求改变方针，采用可持续经营方式、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机制。2020年，国家中央权力按照中国模式实行民主化。过去国家忽视或故意无视的重大公众性任务早已由无数非政府组织接手”。另一种预测则是“物价飞涨、失业和贫困加剧、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外商撤出、经济停滞不前。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是：强硬派掌握了中国的政权。2017年爆发全国抗议，军队和警方镇压，数万人被捕。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叛国及策划和实施暴力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判处长期徒刑，为首的人被处以死刑”。这两种情景大概都是西方愿意看到的未来中国。

中国上两派并无歧见，差别仅在于手段的运用。美国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我们必须更具进攻性》的标题下，反复声称：“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这是自由世界观：我们与中国人做的生意越多，他们就越会变得与我们一样。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存在一种信念，即只要经济合作就会带来变革——通过法治国家原则和通过形成一个以后将要求得到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等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这也许不起作用。”^① 他所代表的“鹰派”因而常常迫不及待露骨地威胁要对中国使用超经济的强硬手段，甚至不惜挑动“台独”打压中国。^② 正是因为鹰派的这一观点正在被美国整个统治上层所接受，所以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整体性打压在加剧。

从根本上说，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当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误判，就在于它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未能解决其合法性问题，而且只要不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就决然不可能解决这一执政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这些年来在西方轮番或并肩上阵的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趋同论”等的思想温床。因此，它一直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高悬在空中没有实际意义的口号，对稳定政权起实际作用的是经济增长和儒家传统。美国财政部资深顾问、同时也是其经济策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鲁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东亚国家领导人强调股市成长，将他们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经济成就上，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这个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是经济快速成长。中国大陆现在就在模仿这个模式，并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安定力量……”^③ 当美国《时代》再次把胡锦涛

^① 德国《时代》周报2008年1月1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月24日第16版。

^② 据香港《镜报》月刊2008年1月号载署名“史威”文章，揭露台湾当局陈水扁所推出的所谓宣示“台湾独立”的“入联公投”，原来竟是美国政坛主流势力的设计，想以此激化矛盾，“把最后一个‘共产帝国’一劳永逸永远地解决掉”。见《参考消息》2008年2月12日第10版。

^③ 《参考消息》2002年9月4日第1版。

作为2007年的封面人物，在介绍其入选的理由时却匪夷所思地认为胡锦涛是借助儒家思想治国，强调大同，他的政治作风显示他追求“君子”理想，正是其谦恭、克制及平衡各方的能力，到目前为止令中国平稳发展。^①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真正成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根据，经济持续增长而国民对于国家制度不认同的情况并不罕见，而经济严重萎缩反而激起国民捍卫国家制度的热情也不乏先例。而依赖儒家传统治国，且不论该传统的现代价值如何，单就其固有的缺陷而言，不借助于其他思想体系，就不能将其有生命力的内容拯救出来。因此，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目前显然处在过渡状态，“西化”、“分化”正逢其时。

如果，上述观点仅表达出西方敌对势力的一相情愿和妄自尊大的话，我们还不必太在意。但是，如果这种想法蔓延、渗透到整个国际舆论和广大国民中，他们就可能做到“不战而胜”。最近的一个例证是，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刚踏进2008年、执掌印度西孟加拉邦政权的印共（马），在庆祝其建党42周年之际，“正式改信资本主义”。而该党领导人巴塔查尔吉居然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意识到，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化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中得到启发。”^②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却是在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新探索；虽然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但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延续。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决不走“老路”（即不照搬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尤其已被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模式）和决不走“邪路”（即决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搞“全盘西化”）的实质。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伟大旗帜举起来、打出去，以获得国内外更为广泛的认同，是我们面临的一大任务。

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

^① Orville Schell: Person of Year 2007 - Hu Jintao, *Time*, December 19, 2007.

^② 《参考消息》2008年1月27日第3版。

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话语，必然对我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各种思潮的跌宕起伏折射出来。“非意识形态化”、自由民主主义以及“儒化中国”就是具有典型性的三大思潮。从表面上看，三种思潮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也不乏相互否定之处，但从实质上看，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它们都着力于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般地说，自由民主主义一直扮演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虽也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但不排除必要时的妥协和随时可能的利用；“非意识形态化”似乎是针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中立化立场，事实上人们也在各种意义上使用它，但它的本意是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拒斥，因而表明了其意识形态立场；而“儒化中国”则以本土文化的面貌反对一切“外来文化”（含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列主义），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其主要针对性还是很鲜明的^①。

最早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在最近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那种思想体系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我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信念体系’，而是把它看作在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我注意到我大体上把这一术语归到左派思想上，因此限制了它的范围。”^②他清楚地表明了“非意识形态化”这一判断的针对性是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它符合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判断吗？马克思是否仅把意识形态视为19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及其所催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① 在今天着力鼓吹“复兴儒学”的代表人物毫不掩饰地攻击道：“在当今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极点。”“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只是当今世界上许许多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马列主义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在西方深厚的传统文化中马列主义没有根。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我们从他的这种文化定位中就可以看出，在针对马克思主义方面，“西化”中国和“儒化”中国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它们间的差异。

^②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